

论城乡统筹发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

蒋时节¹,任波²,祝亚辉³,景政基³

(1. 重庆科技学院,重庆 401331;2.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重庆 401331;3. 重庆大学,重庆 400044)

摘要:通过研究城乡统筹发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一方面,城乡统筹将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益;另一方面,城乡统筹将促进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改革及创新,重点包括改革公共财政投资及管理体制、创新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模式。文章得出城乡统筹发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效率方面而且体现在公平方面的结论。

关键词:城乡统筹发展;基础设施投资;影响

中图分类号:F3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0)06-0033-07

一、引言

中共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强调“五个统筹”,将“统筹城乡发展”置于首位,并把“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之一^[1]。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强调“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2]。十七大报告重申“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3]。

十七大上胡锦涛总书记还要求加强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4]。并强调“三个只许加强,不许减少”,即好政策只许增加、不许减少;支农投资只许增加、不许减少;财政用于农村公共品开支只许增加、不许减少。温家宝总理说:“我看新农村建设不能搞两三年,要搞就要搞上十几年。投资在现有基础上每年要增长,连续投入十几年。”^[5]2008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明确指出:以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为主题,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形成促进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机制^[6]。城乡统筹发展之于基础设施投资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和城乡统筹是对“三农”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制订极具解释力和现实性的两个分析视角。“三农”问题的最终解决不仅有赖于对延续至今的农村自身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进行改革与调整,还需立足于统筹城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价值理念达成城乡公共产品的统筹供给^[7]。

收稿日期:2009-12-22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科学技术研究项目“城乡统筹下基础设施投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重庆市为例”(KJ081414)

作者简介:蒋时节(1973-),男,云南昆明人,重庆科技学院建筑工程学院高级工程师,博士,香港理工大学建筑及房地产学系博士后,主要从事房地产投资、工程项目管理、城乡统筹及基础设施建设研究。

二、城乡统筹发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

(一)城乡统筹将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益

1. 城乡统筹将加大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缩小城乡差距

城乡统筹旨在综合考虑城乡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形成缩小城乡差距的合理化体制,促进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机制的转变和城乡协调发展制度的创新,彻底打破或消除城乡差距扩大化机制及其运行环境^[8]。世界发展报告(2004年)指出,贫困人口很难获得有效的公共服务,如道路、饮水、通讯等^[9],但这些服务对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0]。Calderon and Serven的研究表明,增加落后地区公共物品的提供数量和提高公共物品的提供质量对于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有显著作用^[11]。

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是统筹城乡公共品供给^[8]。中国当前的城乡差别,最主要的体现就是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和供给制度的差异。政府要改变“城乡分割”、“重城轻农”的非均衡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向农民提供与城市居民大体均等的公共产品,应切实加大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力度^[12]。为此,一是要进一步调整现有的国民收入和利益分配格局,从根本上破除城乡分割的“二元”公共产品供给基本制度和模式,加快推进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的改革与完善,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符合国际惯例,城乡统一、均衡、公平、公正、平等的新型现代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和制度。二是要以坚持城乡供给统筹为原则,对城乡供给逐步实行统一筹划、统一政策、统一标准、统一待遇^[13]。三是要按照公共产品的类别层次,确定城乡各类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科学合理地划分各级政府提供产品的职能边界、职责和义务范围^[12]。

此外,农村公共品供给存在的供给不足、资金缺位等问题,需要通过城乡统筹来进一步加大其供给力度,增加政府对农村公共品的投入^[14]。张亦工等按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民增收弹性→财政农业支出→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农民增收”的逻辑顺序,从财政角度测算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民增收的政策效应,并提出整合财政资金、加大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政策思路^[15]。

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一些国家的统筹实践也收到了较好的效果。韩国实施了“新村运动”以推进乡村经济、社会福利与空间环境的发展^[16-17];日本通过补贴政策,振兴产业、实施福利、建设综合环境,实

现了以开发北海道为主的均衡发展目标^[18];澳大利亚则以“均等化机制”的实施,完成向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公共物品提供;美国通过补贴支持、鼓励私人投资等手段实现了基础设施、基础教育、高新产业建设、环境保护等统筹工作指标;德国、意大利通过补助基础设施投资、发展工业园区、扶持中小企业等手段缩小了城乡的差距。中国与国外的发展状况不同,但国外的举措对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指标体系的确立不无启示及借鉴意义^[19]。

已经完成发展转型的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在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过程中,有一个时期,国家投资的优先次序应该有一个重大改变,对农村的投资要放在优先的位置,并且投资量必须增加^[20]。此外,一些发达国家为了保证粮食安全,维护本国农业发展规模和农民利益,加大了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在日本,政府不仅对农村道路、水利设施等全额投资,且给予农民大量补贴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购买大型农业机械设备^[21]。

2. 城乡统筹将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益、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城乡统筹发展就是在一定区域的城乡发展问题上,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和共同繁荣为最终目标^[22]。许多学者认为城乡协调发展就是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城乡差别完全消失、城乡关系达到完全融洽;也有学者认为城乡协调不是城乡差别消灭,而是在于改善城乡结构和功能,协调城乡利益和利益再分配,实现城乡生产要素合理配置,城乡经济、社会、文化持续协调发展;还有人认为城乡协调发展是平等发展,其核心是城乡经济利益平等^[23-24]。郭翔宇等认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长远目标为城乡地位平等、城乡开放互通、城乡共同繁荣进步^[25]。徐静珍等提出城乡统筹的三大目标:城乡经济统筹、城乡社会统筹、城乡生态统筹^[26]。

有学者对中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进行了量度和实证分析:由于大中型农村基础设施(如乡村道路)具有较强的外溢性,其由政府或集体经济负责投资建设的成本可能比农户的(成本)要低;尽管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呈现下降的趋势,但其效益依然非常高,投资农村公共基础设施不仅经济上可行,而且由于农业的基础性地位,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还具有较强的政治性;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益的变动与国家宏观的农业政策和投入强度有很密切的相关性,当国家的宏观政策和投入强度向农业倾斜时,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益就非常高^[27-28]。

在城乡统筹下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对合理配置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增加社会就业具有特殊的作用和功能。此外,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投资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对将现代文明引入农村、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均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28-29]。同时,基础设施的建设可以改善农村投资环境,增加其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分流或引导社会其他部门的富余资源转移到农业和农村中去^[30]。

综上所述,实行城乡统筹对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益,促进城乡协调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城乡统筹将促进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改革及创新

城乡统筹的真正内涵是由政府承担农村的公共开支和基础设施开支^[5],但区分公共产品的供给与生产也相当重要^[31],不然就容易导致政府以供给效率为由推脱供给责任^[7]。公共产品的供给指的是供给主体甚或筹资主体问题;公共产品的生产则是具体生产方式,以效率为导向,一般有公共生产(政府直接组织生产)和私人生产(非政府组织或个体组织生产)两种方式。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生产可以有多种组合形式,政府提供并不意味着必须由政府组织生产,而公共产品的私人生产也并不意味着否认政府供给^[7]。此外,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是从消费角度来讲的,并不排除生产的竞争性,引入市场竞争能打破“全能”政府的垄断,恰恰是保证公共产品生产效率的机制^[32]。因此,实行城乡统筹将有助于基础设施投资领域的改革及创新,其重点是改革公共财政投资及管理体制、创新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模式。

1. 改革公共财政投资及管理体制

在传统体制中,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是由国家来提供的,而农业、农村的同类公共基础设施要由农民自主解决,国家只给予适当补助。基于这种公共品供给政策,多年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在国家财政强大投入支持下变得越来越好,而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在农民无力投入下变得越来越差强人意^[33]。实行城乡统筹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就是要在遵循“帕累托改进原则”和保证城市居民现有效用水平不降低的前提下,将城市创造的一部分财富用于提供农村公共产品,从总体上提高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34]。

依据马斯格雷夫和罗斯托的公共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阶段理论,政府应承担起为农村提供基础设施的主要责任,通过财政投入改善农村的交通、水

利、通讯等基础设施,为农村经济发展创造条件^[35]。但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存在三种状态,即“缺位”、“错位”和“越位”^[36]。且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不科学,基本上都是自上而下的“供给主导型”决策机制^[7,34]。

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错位导致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过剩与短缺并存,浪费了有限公共资源^[37]。一些公共服务机构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社会效益,导致公共服务成本高,服务质量低。甚至有部分公共产品的提供,由于政府的决策出现偏差,损害了农民利益,从而影响了资源的有效配置^[38]。还有就是政府越俎代庖,未做仔细调查和科学论证,随意决策、盲目投资,给农民带来经济损失。凡此种种,均降低了公共产品供给效率^[13]。李锐、罗仁福的各自研究也表明,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投资的短缺性、非生产性公共基础设施所占的比重低和市场的无效率^[27,39]。

由于公共产品和财政支出经常向城市倾斜。只有对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实施改革,对城市和乡村实行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标准,才能从根本上统筹城乡发展^[40]。因此,为了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给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改善提供稳固和坚实的物质基础,政府有必要在城乡统筹的前提下,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角度出发,调整财政投资和支持的方向与力度。由于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需要以政府主导的方式、实行“突击式”发展战略,将有限资源集中投入这一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最为关键,但仅依靠县、乡、村投资,则缺乏必要的资金,只能向农民伸手加重其负担。因此,需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由中央和地方共同出资,并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倾斜^[30]。

同时,要以统筹城乡发展为原则,尽力避免因为重视对农村基础设施的突击式供给而忽视城市基础设施的同步跟进:一是在基础设施资金供给总量上保持适度的城乡比例,不能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停滞来换取农村基础设施供给的增长。二是尽可能扩大城市和基础设施对农村的服务领域、服务对象和覆盖范围。三是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必须综合考虑城乡的需求和应用^[41]。

廖家勤^[42]、余佶^[43]通过研究认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主体虽呈多元化趋势,但政府财政投入和农户投入仍占主要地位。并指出:要明晰农村基础设施的产权和经营管理权,利用市场化运作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盈利性基础设施的管理和维护;发挥政府公共财政主渠道作用,整合财政支农资金,建立城乡

一体化的公共财政投入体制,依法明确、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财权、事权范围,破除有限财力的约束、调动各级政府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的积极性;通过新的“投工投劳”和“一事一议”等制度积极引导农民参与社区性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44]。此外,政府还应科学论证、合理确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近、中、长期目标,建立充分体现农民需求的偏好显示机制和自下而上的基础设施供给制度,选择与实施切实可行、有效的基础设施建设政策和举措。

林毅夫还论证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和启动内需的重要性,提出了调整财政政策趋向,增加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政策建议^[45]。而付永等认为可持续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与农村基础设施的供给和生产相关的制度激励直接联系的,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如改革财政体制、开拓融资渠道、市场运作等,才能克服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所面临的内在的制度困境^[46]。

2. 创新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融资模式

传统经济学理论认为,公共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必须由政府提供,以弥补市场提供的无效率和资源浪费。罗纳得·科斯(《经济学上的灯塔》,1974年)的研究表明,纯粹的公共产品由私人提供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更有效率的。因此,李彬、冯涛等借鉴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创新做法,提出在加强对提供公共服务的宏观管制的同时,开放并将竞争机制引入一些公共服务领域,引导民营资本介入准公共产品的供给^[47-48]。

但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村基础设施真正实现市场化的还很少,政府在此领域仍处于垄断地位^[49]。在农村,公共投资来源主要是两大类:政府拨款(乡及以上政府)和农村自筹(包括村集体和村民集资或投劳)^[50]。然而,农村基础设施有着极强的公共物品属性和投资金额大、回收周期长等特点,仅由政府 and 农村直接投资难以持续、有效、稳定地发展^[51]。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后,村一级的投资能力大幅削弱,农民的资金又较为分散和有限,如何扩大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来源就显得尤为重要^[52]。

对此,国内许多学者认为,应引进新的投融资方式,例如借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常见的BOT、BOOT、PPP、股权融资等模式,形成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进一步拓宽投资渠道^[21,48,53-57]。此外,卢现祥

认为,中国基础设施领域垄断现象还很严重,急需进行市场化改革,在基础设施领域引入竞争和促进反垄断是较为理性的选择^[58]。胡家勇提出了基础设施领域改革的基本思路:开放基础设施领域产权,允许非国有资本进入,形成较强的所有者约束和有效的治理结构,强化市场竞争,以提高基础设施企业市场反应的敏感性^[59]。

国际上关于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融资方式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结论。Easterly和Senven对拉丁美洲地区的研究表明,公共部门正在削减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其预算水平仅为10~15年前的40%~50%^[60]。Briceno等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主要来自公共投资、官方发展资助(ODA),但在私人部门参与基础设施融资后,ODA所占比重开始下降,现在私人部门投资已经超过ODA^[61]。

由此可见,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私人投资日益受到重视,这主要是因为私人资金可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更好地分担风险、划清责任,从而有效加强对投资的监督和管理^[49]。总而言之,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政府投资应发挥主导性作用,但在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应建立起以政府为导向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体系^[62]。

三、结论及评述

(一) 结论

城乡二元结构既是城乡差距产生的根源又是城乡差距深化的结果。导致二元结构产生和城乡差距扩大的制度根源是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效率优先的制度安排,这集中体现在国民经济的发展中,中国先后实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优先发展战略和城市居民优先的社会发展战略,这里的效率侧重于资源的配置,效率优先即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实现资源的配置向工业、城市、市民倾斜^[63]。

但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课题组^①认为:统筹城乡发展,是相对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而言的。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质是给城乡居民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城乡布局规划、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等手段,促进城乡各种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不断增强城市对农村的带动作用 and 农村对城市的促进作用,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经济社会实现均衡、持续、协调发展,促进城乡分割的传统“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城乡一体化的现代“一元经济社会结构”转变^[64]。

①浙江省农业和农村工作办公室课题组. 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意义[J]. 浙江经济, 2003年21期, 18-19。

统筹城乡公共品供给是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要确定一种产品是否是公共产品,首先看其是否具有非竞争性,再看其是否具有非排他性。若二者兼备,则是纯公共产品;若二者均不具备,则是非公共产品;若二者只具备其一,则是准公共产品^[65]。而基础设施作为一种准公共品,其投资规模与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乡发展的均衡状况^[8]。

此外,健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明确政府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职责也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内涵^[5]。一要明确应由各级政府而不是农村社区的村民自治组织充当农村公共产品的主要供给主体。二要明确界定各级政府的权利和责任。政府必须在宏观上确保公共资源在不同地区、区域间的公平配置。三要明确政府对公共产品供给的边界,保证有限的公共资源得以合理、有效利用^[47]。也只有准确界定政府与市场各自作用范围的基础上,坚持市场调节与财政调节相结合的原则,才能有效地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66]。

综上所述,城乡统筹发展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效率方面而且体现在公平方面。

(二) 评述

从国内外研究现状看,如何通过城乡统筹提高基础设施投资效益、改革和创新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进而缩小城乡差距、体现社会公平,正在成为学术界及政府关注的话题。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信息,2008年第四季度中央新增1 000亿资金中,290多亿元用于农业、林业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67]。加大投资力度、增加新的投资项目固然重要,但是在全球面临经济危机的前提下,如何发挥城乡统筹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使基础设施投资更好地产生综合效益,将更有现实意义。因此,今后在此方面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是进一步分析研究城乡统筹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机制。这对改革和完善基础设施的公共财政投资及管理体制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此方向上,中国一些学者已经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但是仍有一些问题没有分析清楚,比如城乡统筹和公共财政政策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影响机制和程度,中央与地方以及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作用机制等都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二是从农民需求的角度深入探讨基础设施投资决策机制,彻底改变以往“自上而下”的供给模式。

因此,通过对一些典型案例进行深入剖析,从中找出城乡统筹对基础设施投资效益的决定(关键)因素,重新构建以农民需求为基础的投资决策机制,并探讨这些关键因素的相关关系和内在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7,465.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066.
- [3] 胡锦涛.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 人民日报,2007-10-25(1).
- [4] Report to the Seven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October 15[R]. 2007.
- [5] 温铁军.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比较发展研究[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4):4-10.
- [6] 宋振远. 开启统筹城乡发展新时代,聚焦新世纪五个一号文[EB/OL]. (2008-01-31). <http://www.news.xinhuanet.com>.
- [7] 李海金.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城乡统筹与新农村建设[J]. 东南学术,2007(2):46-53.
- [8] 刘明慧. 基础设施投资城乡统筹的有效性探讨[J].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市行政学院学报,2007(3):32-36.
- [9]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R].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 [10] 张林秀.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投资情况及区域分布[J]. 中国农村经济,2005(11):18-25.
- [11] CALDERON C, SERVEN L. The effects of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growth and income distribution[R]. The World Bank, LACVP, Washington DC, 2004.
- [12] 康松,熊尚鹏,论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现状及其增加途径[J]. 商业研究,2006(9):193-196.
- [13] 魏世军.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与创新的思路[J]. 成都行政学院学报,2006(5):42-44.
- [14] 邓有高,王为民. 略论我国农村公共品的政府供给[J]. 农村经济,2003(10):16-18.
- [15] 张亦工,胡振虎.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民增收研究——一个农业财政资金整合的视角[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90-97.
- [16] 李水山. 韩国新村运动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J]. 当代韩国,2001(2):25-29.
- [17] 赖晨. 论韩国新村运动的得失及其启示[J]. 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11):25-27.
- [18] 石爱虎. 国外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验及其启示[J]. 中

- 国软科学, 1997(6):105-108.
- [19] 李银星, 杨印生. 影响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经济因素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06(3):27-31.
- [20] TIMMER P. The agricultural transformation [M]// EICHER C, STAATZ J. Inter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third edition). Baltimore, M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1] 彭代彦. 农村基础设施投资与农业解困[J]. 经济学家, 2002(5):79-82.
- [22] 杨建涛. 河南省城乡统筹发展测度研究[D]. 郑州: 河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8.
- [23] 景普秋, 张复明. 城乡一体化研究的进展与动态[J]. 城市规划, 2003(6):30-35.
- [24]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05 中国可持续发展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 [25] 郭翔宇, 颜华. 统筹城乡发展——理论、机制、对策[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7.
- [26] 徐静珍, 王富强. 统筹城乡发展目标及其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原则[J]. 经济论坛, 2004(15):91-92.
- [27] 李锐. 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效益的数量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03(2):5-9.
- [28] 孟庆翠, 徐学东. 农村生产性基础设施投资效益实证分析[J]. 人民长江, 2008(12):106-108.
- [29] 刘爱辰. 中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机制分析[D]. 长春: 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 [30] 李成贵.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理论、意义和政策[J]. 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1):1-7.
- [31]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制度激励与可持续发展[M]. 毛寿龙,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0.
- [32] 吴晓燕. 扩大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城乡统筹发展[J]. 社会科学家, 2006(6):56-59.
- [33] 雷倩. 城乡统筹发展的思路探讨[J]. 科技信息(学术版), 2006(7):28-29.
- [34] 江明融. 构建城乡统筹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研究[J]. 农村经济, 2006(8):14-16.
- [35] 刘文祥, 李长源. 关于公共财政支农的途径[J]. 湖北社会科学, 2005(9):75-76.
- [36] 郭泽保. 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职能分析[J].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2005(4):29-32.
- [37] 林万龙. 中国农村公共服务供求的结构性失衡: 表现及成因[J]. 管理世界, 2007(9):68-74.
- [38] 贾康, 孙洁. 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提供机制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06(12):68-74.
- [39] 罗仁福. 中国农村公共物品提供研究——以村公共基础设施投资为例[D]. 北京: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6.
- [40] 刘荣增. 城乡统筹理论的演进与展望[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4):63-67.
- [41] 郭勇. 三元结构条件下中国农村基础设施供给问题研究[J]. 社会主义研究, 2005(3):66-69.
- [42] 廖家勤. 财政紧约束下有效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选择[J]. 农村经济, 2006(3):58-61.
- [43] 余信.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 政府、社区与市场供给——基于公共品供给的理论分析[J]. 农业经济问题, 2006(10):21-24.
- [44] 王永莲.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融资问题研究[J]. 太原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4):26-29, 37.
- [45] 林毅夫.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启动农村市场[J]. 农业经济问题, 2000(7):3-4.
- [46] 付永, 曾菊新.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制度激励问题探析[J]. 生产力研究, 2008(3):26-28.
- [47] 李彬, 李葆华.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政府供给责任研究[J]. 乡镇经济, 2006(4):11-14.
- [48] 冯涛.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融资体系重构[J]. 农村经济, 2007(1):74-77.
- [49] 傅晋华. 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与运营管理: 研究综述[J].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08(1):110-114.
- [50] 张林秀, 罗仁福, 刘承芳, 等. 中国农村社区公共投资的决定因素分析[J]. 经济研究, 2005(11):76-86.
- [51] 张军, 蒋维. 改革后中国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理论与经验研究[J]. 社会科学战线, 1998(1):36-44.
- [52] 涂进万. 免税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失衡问题[J].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4):370-372.
- [53] 杨林. 公共财政框架下农村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J]. 宏观经济研究, 2005(10):56-59.
- [54] 陈文科, 林后春. 农业基础设施与可持续发展[J]. 中国农村观察, 2000(1):11-23, 82.
- [55] 吴朝阳. 非盈利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筹资方式分析[J]. 当代财经, 2004(9):52-55, 59.
- [56] 刘家伟.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融资模式研究[J]. 中央财经大学学报, 2006(5):52-56, 67.
- [57] 甘琳, 蒋日雄, 傅鸿源, 等. 中国农村基础设施融资模式研究[J]. 建筑经济, 2008(4):43-45, 49.
- [58] 卢现祥. 论政府在我国基础设施领域促进竞争及反垄断中的“诺斯悖论”[J]. 管理世界, 2002(2):82-87.
- [59] 胡家勇. 论基础设施领域改革[J]. 管理世界, 2003(4):60-68.
- [60] EASTERLY W, SERVEN L. The limits of stabilization [M]. Chicag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61] BRIEENO C, ESTACHE A, SHAFIK N. Infrastructure

- service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ccess, quality, costs and policy reform [R]. the Word Bank, 2004.
- [62] 黄利恒. 我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J]. 当代经理人(中旬刊), 2006(21): 1403 - 1404.
- [63] 陈国富, 倪春华. 城乡统筹发展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J]. 理论界, 2006(12): 36 - 37.
- [64] 颜华. 我国统筹城乡发展问题研究[D]. 哈尔滨: 东北农业大学, 2005.
- [65] 范建双. 基于城乡统筹的新型城市化问题研究[D]. 哈尔滨: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6.
- [66] 孙开, 田雷.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与财政投入研究[J]. 经济研究参考, 2005(18): 11 - 18.
- [67] 中央新增百亿元农村基础设施投资开始发挥拉动内需等效应[EB/OL]. (2009 - 01 - 06).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up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JIANG Shi-jie¹, REN Bo², ZHU Ya-hui³, JING Zheng-ji³

(1.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ongqing 401331, P. R. China;

2. Chongqing City Management College, Chongqing 401331, P. R. China;

3.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P. R.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studies the influence of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up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on the one hand, urban and rural coordination would increase the supply of rural infrastructure and improve the return 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on the other hand, such coordination would stimulate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domain, with emphases placed on reforming public fiscal investment and administration system, as well as innovating investment mode for new rural infrastructures. It then comes to this conclusion that influence of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upo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cludes not only efficiency but equity as well.

Key words: coordinated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fluence

(责任编辑 傅旭东)